

# 论南宋江西诗派典型诗人赵蕃的诗学理论

施常州

〔摘要〕 作为江西诗派在南宋的代表诗人,赵蕃在南宋中后期诗坛占有重要地位。其诗学理论,既包括儒家传统的诗学观点,也融入了宋代理学和江西诗派诗论等宋型文化特点。从诗歌本体论角度看,他认为气是诗歌的本源,诗歌是儒家理想人格,即儒家的道或程朱理学所谓理或气的外化;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忠实纪传。与前述两个理念密切联系,同时也显示了宋型文化特点的观点是:儒经等典籍是诗歌的源泉,自然山水也是诗歌之源。从诗歌创作论的角度看,赵蕃特别服膺于吕本中的“活法”理论,认为诗歌以自然天成成为贵,也因此对南齐谢朓“流转圆美如弹丸”的观点赞赏不已。与“活法”理论联系紧密,赵蕃强调诗歌创作中“悟入”和“自得”的重要作用,即诗歌要有自出机杼的独创性,要因物感兴、善于抓住灵感妙悟,要描绘出生活物象的特征与神韵。

〔关键词〕 江西诗派;南宋;赵蕃;诗学理论

南宋隆兴元年(1163)以后的乾道、淳熙年间,是宋代文学继北宋元祐年间繁荣发展之后的又一个高峰。赵蕃(字昌父,号章泉先生)的主要创作活动,即发生于“乾淳之盛”年代。他与“中兴四大诗人”以及朱熹、辛弃疾同时代,又因寿至八十七岁,拥有较长的文学活动时间。赵蕃只有六年仕宦生涯,其余大部分时光,均隐居在江西省怀玉山中,过着穷愁潦倒的生活,却德行与诗名俱显,如朱熹《答徐斯远》称赞说:“昌父(赵蕃)志操、文词,皆非流辈所及”(《晦庵集》卷五十四);陆游《寄赵昌甫并简徐斯远》赞誉赵蕃:“赵子乃宿士,山立谁敢侮。寓名祝融祠,蓑笠卧烟雨。高吟三千篇,一字无尘土”(《剑南诗稿校注》卷四十五);刘克庄《寄赵昌父》称赏赵蕃:“一生官职监南岳,四海诗名主玉山”(《后村集》卷一)。他生平创作的诗歌有一万首左右<sup>①</sup>,现存诗三千七百余首。在两宋诗人中,诗歌的数量很多,而且内容丰富,堪称忠实记录南宋中期社会状况的历史画卷。

江西诗派,从北宋大诗人黄庭坚始创,至宋元之际的文史学家方回总结其重要地位,已经有两百多年。赵蕃是南宋中期江西诗派的典型,方回《次韵赠上饶郑圣予[沂][并序]》说:“上饶自南渡以来,寓公曾茶山得吕紫薇诗法。传至嘉定中,赵章泉、韩涧泉正脉不绝。”<sup>②</sup>指明了南宋江西诗派的主要代表诗人有吕本中(号紫薇)、曾几(号茶山居士)、赵蕃和韩淦(号涧泉)。同时,方回还称誉赵蕃是宋代官位低下而诗艺超绝的三大诗人之一,其《送胡植芸北行序》云:“宋人高年仕宦不达,而以诗

施常州,文学博士,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 211815)。

<sup>①</sup>南宋文学家刘克庄《韩隐君诗序》记述云:“坐客有曰:‘赵章泉诗逾万首,韩仲止、巩仲至几半之。’”(《后村大全集》卷96)可见,赵蕃是一位诗思敏捷、才华卓越的诗人,而并非作诗一味苦吟的江西诗派末流。

<sup>②</sup>傅璇琮:《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下),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868页。

名世,予取三人焉:曰梅圣俞,曰陈无己,曰赵章泉”(方回《送胡植芸北行序》),把赵蕃与北宋著名诗人梅尧臣和陈师道并列。赵蕃其人其诗,也相继受到明代朱明镐、清代四库馆臣和李慈铭等著名文史学家的称赏。

## 一、赵蕃的诗歌本体论

中国古代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意指探索天地间万事万物存在、产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依据。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一般都把事物的根本,归结为无形无象的、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没有固定形体的“气”“理”和“心”等。

两宋之世,理学家、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把儒家之道看作自然和社会中最根本的理性法则,称为“理”或“天理”,并认为“性即理”,冀望广大封建士大夫通过日常生活中伦理道德和心性修养的提升,体悟到本体高度的“天理”或“性理”的客观存在。南宋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不但继承了二程的性理学说,而且吸收、融合了北宋另外几位理学大家的重要观点,如吸收周敦颐(濂学)和张载(关学)的理气或气化学说,概括了自己对自然万物和社会人生的看法,形成了自身以道德为本体的理学思想体系。

对于宋代以性理为本体的道德哲学体系的内涵、特点和成因等,学者程杰评述:“宋人的人格理想建构中特别倾向于道德自律与品格自尊,社会伦理责任与个人自由意志,理性原则的操守与处世应物的圆通,道义精神的刚方与个人意志雅适的有机统一。这不仅渊源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注重个人与社会,理性与感性之统一的传统精神,同时也是宋以来封建士大夫社会地位和伦理责任提高之现实的反映。”<sup>①</sup>指明了宋代理学强调以理节情(道德自律)与治心养性,即个体情感体验要符合群体道德规范的鲜明特点。

### (一)“学诗如学道,先须养其气”:诗歌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外化

养气或养浩然之气说,源于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他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浩然之气,寓指浩大刚正的精神。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儒认为,理未曾离开气,但是理是无形的,气是有形的。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提高到了本体的高度。朱熹说:“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朱子语类》卷一)诗歌是儒家之道,或理与气的外化,即理与气是诗歌的本体,因此,士大夫文人或诗人,首先要明理、养气。

江西诗派宗师、北宋大诗人黄庭坚在《与徐师川书》中说:“文章乃其粉泽,要须探其根本。根本固则世故之风雨不能漂摇,古之特立独行者盖用此道耳。”(《山谷别集》卷十七)其所言“根本”的涵义,也即治心养气。苏门大诗人张耒的《答汪信民书》也认为:“词生于理,理根于心。苟邪气不入于心,僻学不接于耳目,中和正大之气溢于中,发于文字语言,未有不明白条畅”(《柯山集》卷四十六),表达了文学创作中“气盛”与“言宜”的辩证关系。陆游在其《六言杂兴》(其二)说道:“梦里明明周孔,胸中历历唐虞。欲尽致君事业,先求养气工夫。”(《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六)显然,他把治心养气看成文人士大夫的首要修养。

作为理学背景深厚的诗人,赵蕃也认为气是诗歌写作的本源,诗人首先要养气,其《论诗寄硕父五首》之二说:“学诗如学道,先须养其气。”这与江西诗派南宋前期的代表诗人吕本中和曾几的养气

<sup>①</sup>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研究》,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61页。

观一脉相承,曾几在《东莱先生诗集后序》中回忆吕本中三十多年前对自己的教诲说:“诗卷熟读,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须令规模宏放,以涵养吾气而后可。”<sup>①</sup>曾几对吕本中的话敬若神明,甚至书写在腰带上。宋代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一《赵章泉谓规模既大波澜自阔》记述说:当赵蕃在诗坛声名远播时,很多年轻人纷纷前来向他求教诗法,为了有效传递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和写作技艺,他把吕本中谆谆教导曾几的这段话,总结为一首论诗诗,出示给迫切希望获取作诗法门的求教者,其中的“若欲波澜阔,规模须放弘。端由吾气养,匪自历阶升”<sup>②</sup>等句,表明赵蕃对吕本中“养气以壮大诗歌规模”等主张的由衷赞赏。

赵蕃主张的气就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与道德规范。诗人养气的同时,还能治心养性。他在《论诗寄硕父五首》之二中提出“学诗如学道,先须养其气”,随后还强调“植苗无它术,务在除荒秽”,谓要驱除心中的杂念,才能养成理想人格或浩然正气。赵蕃《次韵潘端叔送行二首》之二赞扬友人潘友端云:“中怀松柏坚,外暴丹雘墜”“胜私与致果,曰克仍曰毅”,他激赏潘友端具有文化礼义之邦的气度,怀抱松柏一样坚贞不渝的操守,创作了很多语言优美的诗歌。

## (二)“六义极渊源”、“不忘相博约”:儒经等典籍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泉源

北宋诗人从西昆体诗人开启以学问为诗,到江西诗派蔚然成风。宋人所说的学问,包括读书穷理和心性修养两方面内容,重学问首先强调多读书。黄庭坚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七)其《与洪驹父书》具体说:“常须读经书,味古人经世之意,宁心养气。”(《山谷外集》卷十)认为读书尤其是读经书,不但可以积累学养,增加诗歌的内蕴,还能陶冶性情,使人超脱流俗。即使如此还不够,需要广泛涉猎各类各家典籍,其《书枯木道士赋后》说:“闲居当熟读《左传》、《国语》、《楚辞》、《庄周》、《韩非》,欲下笔略体古人致意曲折处,久之乃能自铸伟词,虽屈宋亦不能超此步骤也”(《山谷别集》卷十),明确表达了诗人学养对诗歌构思和语言表达的重要性。另一位文艺全才苏轼在《送任佖通判黄州兼寄其兄孜》中说:“别来十年学不厌,读破万卷诗愈美”,在《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中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苏轼诗集》卷六),表达了读书不仅要破万卷,要广博;还要精读,要熟读深思。

赵蕃认为学问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泉源。其《重阳近矣,风雨骤至,诵邠老“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辄为一章,书呈教授沅陵》说:“六义极渊源,一贯相授受”,认为《诗经》等儒家经典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源泉。《论语·雍也》云:“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赵蕃对此心领神会,其《蕃舫舟湘西之明夕,郑仲理、吴德夫、周伯寿、黎季成共置酒于书院阁下,追钱者邢广声、王衡甫。时戊申仲秋七日》记述他在湖南长沙居住期间,与郑仲理等友人相处融洽,关系密切,临别前还念念不忘与友人互勉:“不忘相博约,未可间知闻”,希望众人继续广博地研习典籍,依礼约束自己的行为,也希望朋友之间情谊能长久接续。与宋代大部分文学家和理学家一样,赵蕃自幼即酷爱读书,养成深厚的理学基础和渊博的文学与文化修养。他不但悉心研读儒家经学书籍,还广泛涉猎史书、前代诗文作品,甚至小说、笔记等。因此,其诗歌创作博采众长,深得江西诗派诗歌艺术的精髓,汲取了历代名家如陶潜、杜甫、韩愈、黄庭坚、苏轼、韩驹、吕本中、曾几和潘阆等人的诗学思想。也由于这一原因,其诗歌的题材内容与写作艺术取法较宽,具有广博的思想、文化和艺术渊源。

对于学问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赵蕃主张渐修,即通过平日积累修成正果,走向成功。其《学诗诗》其一云:“学诗浑似学参禅,识取初年与暮年。巧匠易能雕朽木,燎原宁复死灰然。”从初年到暮年,参

<sup>①</sup>王琦珍:《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

<sup>②</sup>[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6-7页。

禅悟道,死灰复燃的星星之火,可以燃烧成燎原大火。这首禅喻诗,认为学习写诗需要长期积累修养,要通过读书获取学问、奠定基础;创作中下了足够的功夫,就有可能诗艺精进,最终获得成功。其《和折子明丈闲居杂兴十首》其五是一首论诗诗:“诗有江西派,首书江夏黄。精神如有得,形似直堪忘。拱把至合抱,江流由滥觞。屹然成巨室,勇若泛飞艎”,其中“拱把至合抱”等四句,表达作诗要从源头积累学问和诗歌素养,如同涓涓细流汇成滔滔长河,或者拱把小树长成合抱大树,还被制作成在江河湖海劈波斩浪的大船,形象地比喻了诗人从小家到大家,乃至名家的巨变过程。

### (三)“人穷诗乃工”,“遂令风雅作”: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忠实纪传

穷而后工是儒家传统的文学观,重视文学的事功教化作用。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云:“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与宋代的许多文学家一样,赵蕃也非常赞赏欧阳修穷而后工的观点,其《近乏笔,托二张求之于市,殊不堪也。作长句以资一笑》云:“诗老作诗穷欲死,序诗乃得欧阳氏。序言人穷诗乃工,此语不疑如信史”;《枕傍有杜集,看其行役诸诗有感复书》说:“既将取诗名,先应历诗穷。不见杜陵老,飘转一世中”,认为大诗人的“穷”,既有生活际遇的潦倒困苦,更有政治仕途的不顺。

赵蕃诗中,经常提及杜甫描写唐代社会现实的诗句,对杜甫仁政德治的政治理想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赞叹不已,如《叔文再用韵赋诗,亦复用韵答叔文,兼呈伯玉昆仲》云:“杜陵心喜归茅宇,无复长安叹今雨。事虽聊向朱阮论,身盖自与稷契许。胡为流落不称意,长铗貂裘遍南土。我尝细把遗诗读,大半悲伤闻战鼓……诗穷如是仅得名,欲作诗人宁易语?”他对黄庭坚等人能发扬《诗经》和杜甫诗歌的风雅精神由衷钦敬,推崇备至,其《挽宋柳州绶》云:“少陵在大历,涪翁在元祐。相去几百载,合若出一手!流传到徐洪,继起鸣江右。遂令风雅作,千载亡遗究。”在《别范建康》中,他感慨自己“早日学诗才得穷,人穷乃复愧诗工”,自谦诗艺无所成就;在《次韵潘端叔送行二首》之一中,他对自己钦敬的好友说:“君言固邹鲁,君笔犹汉魏”,赞扬潘友端(字端叔)学养渊深、正气凛然,秉笔写作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的诗文。

### (四)“作诗政欲江山助,老矣东西南北人”:江山为助笔纵横

两宋诗人酷爱山水名胜,在游历壮丽的自然山水时,不但可以增长见闻,陶冶情操,还能够获取创作题材与灵感,即得到所谓“江山之助”,也是诗人不可或缺的“取材之道”。苏轼《南行前集叙》云:“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为咏叹”(《东坡全集》卷三十四),因此,两宋诗人对“江山之助”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颇多议论,这也形成宋代诗学的一个典型特征。黄庭坚在《忆邢惇夫》诗中自评曰:“诗到随州更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山谷集》卷九);杨万里《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云:“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诚斋集》卷二十六),《题金山妙高台》云:“卷舒江山在怀袖”;陆游《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其二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剑南诗稿校注》卷五十),《舟中作》说:“村村皆画本,处处有诗才。”(《剑南诗稿校注》卷四十一)均肯定了游历山水风光与获取创作灵感的密切关系。对此,周裕锴先生分析说:“就陶冶人格性灵而言,宋人相信自然山川中有一种与人性同构的灵气,因而,游历山川可以吸纳自然界瑰奇壮丽之气与幽深玄渺之趣,使人格得以升华,使人性得以净化。”<sup>①</sup>可见,宋代文人沉醉于风景名胜,甚至把旅游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认为山川之美对文学创作具有重要作用。

赵蕃在《题沈弟所作短轴》诗中说:“作诗政欲江山助,老矣东西南北人。”与宋代其他诗人一样,

<sup>①</sup>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赵蕃不但认同社会生活和作家个人阅历是诗人创作的主要源泉,而且对“江山之助”的理念感同身受,认为游览名山胜水可以启迪智慧,激发诗性灵感,比如,他在《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抵鄱阳城。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之四中说自己“生平惯行役”,在《过女儿浦》中说自己“行役殆遍江之南”。从青年时期,他就经常徜徉在美丽的自然山水中,即使路途疲惫,也毫无倦意。其《松原山行七绝》组诗,记录了他陶醉美景的乐趣,其六云:“涉水穿云殊好在,自知元是个中人。何时粗毕尚平志,衡岳匡庐收此身”;其三云:“悠然到处皆诗本,须信山行不负公”。“到处皆诗本”,点明了诗人的快乐源泉。

的确,赵蕃大量的山水诗、行役诗或田园诗,就产生于游览自然山水的旅途中。其《寄谢新安丰守胡达孝见遗近诗一轴,便呈甘叔异、章梦与》云:“平生嗜江山,到处须著语”;《舟中二首》之一云:“频岁崎岖道路劳,江山妙处属吾曹”;《舟中二首》之二云:“诗情本自无多子,深谢江山稍见存”。在旅程中,他经常灵感乍现,《湖州亲旧二首》之二中,他看到美景如画,不禁脱口而出地赞叹:“溪山如许佳,欲画无绝艺”,诗兴大发:“要当稍收拾,一一付诗里”;《江山道中》云:“多少诗情浑漫兴,烟云不隔四山秋。”显然,赵蕃认为记录行役见闻、描摹自然山水,或者抒写羁旅情怀,都是诗歌取之不竭的内容。

赵蕃笔下得“江山之助”的山水诗,显示了典型的宋型文化特征:一是自我色彩更浓,二是议论更多,三是含蕴着忧世与忧生之情。赵蕃身处内忧外患的南宋,内心的悲凉愁苦或忧愤,也时而投射到笔下的山水风物上。比如,其《过分水岭二首》之二云:“不历闽山险,空云蜀道难。有泉皆瀑布,无路不纡盘。酒薄愁难破,诗成鼻为酸。举头唯见日,何处是长安”,其中,“酒薄愁难破”、“何处是长安”等句,抒写了内心的酸涩愁苦和“不见长安”的绝望,含蕴着国破家亡的伤感。同时,赵蕃在寻觅“江山之助”的旅程中,也时常表达对时光流逝、世事变迁和衰老贫病的深沉感慨,以及对隐逸生活的强烈期盼,在寄托诗人胸襟人格的同时,忠实反映了南宋中期士人阶层贫寒的生活境况。

## 二、赵蕃的诗歌创作论

作为江西诗派在南宋中后期的代表诗人,赵蕃对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黄庭坚和南宋江西诗派诗风转变的关键人物吕本中和曾几,都非常钦敬。他尤其服膺于吕本中的“活法”说和“悟入”说,并主张诗人在悟入的基础上,具备自出机杼的独创性与个性特点。

### (一)“玄晖弹丸句,固足名壤穹”:对吕本中“活法”理论的认同与实践

“活法是宋诗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也是宋诗发生重大转折的理论根据。”<sup>①</sup>江西诗派的宗师、北宋大诗人黄庭坚主张诗人首先要有渊博的知识基础;对于诗歌写作艺术,提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诗法理论。由于有具体的句法模式等,确实便于初学者入门学习,但也容易让诗人循规蹈矩,受到束缚,不能实现自我突破、树立个性特点。因此,吕本中为了克服江西诗风影响下诗作流于僻涩尖巧的弊病,提出了在取法杜甫和黄庭坚诗歌范式的同时,还要学习李白、苏轼等大诗人富于才情和个性的创作方法,尤其是苏轼诗歌那种摆脱各种束缚、不见斧凿、自然浑成的意境。

吕本中提出的“活法”说内容如下:“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谢元晖有言,好诗流转圆美如弹丸,此真活法也。”(《夏均父集序》)他认为,诗歌创作既要遵循

<sup>①</sup>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9页。

诗体的规矩,但是又不能被规矩束缚;能有出奇的变化,同时又不违反规矩。总体来说,真正的好诗,就像南齐诗人谢朓所说:诗歌意境浑然一体,语言和韵律“流转圆美如弹丸”,就是真正具有“活法”精神的好诗。比如,陆游、杨万里等南宋诗人,就是从江西诗派的“规矩”、“定法”入手,却又能有自己独特的创造,形成自己鲜明的个性化风格特色,从而达到了“无定法”的“变化”,最终成为南宋中后期诗坛独领风骚的诗豪。

对于吕本中的“活法”理论,赵蕃非常推崇,“在南宋当时的诗人里,‘讲活法’最多的非赵蕃莫属。”<sup>①</sup>赵蕃《琛卿论诗用前韵示之》云:“活法端知自结融,可须琢刻见玲珑。涪翁不作东莱死,安得斯文日再中。”“结融”、“玲珑”,谓诗歌意境灵巧融合,意韵流畅。其《论诗寄硕父五首》之四:“东莱老先生,曾作江西派。平生论活法,到底无窒碍。微言虽可想,恨不床下拜。欲收一日功,要出文字外。”“无窒碍”谓诗歌语言自然流畅。也正因此,赵蕃对谢朓的诗歌艺术叹赏不已,其《十二日登列岫亭,有设空幄者,去之荐福,酌浅沙泉,登大梵之秋屏阁而归,赋诗一首》赞叹说:“玄晖弹丸句,固足名壤穹”;《次韵李商叟见示》云:“新诗自作弹丸羡”,“难迷美玉及精金”;在《和折子明丈闲居杂兴十首》之八,他给自己的诗歌提出了“何时弹比圆”的目标。

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赵蕃的很多诗歌,也的确实践并达到了“流转圆美如弹丸”的“活法”标准。其《重怀思隐之作,因回使寄明叔兼呈从礼、景立》云:“问讯新篁今几长,高出屋下侵廊。遥怜初日弄碎影,想见午风传细香。卧看行吟君得意,昼思宵寐我回肠”,以丰富的想象,抒发诗人对竹子深情绵渺的思念之情,竹叶悠悠的清香,竹影摇曳的情态,描摹细腻传神,富于诗情画意。缠绵悱恻的情思与婉转回环的韵律浑融一体,在咏物诗中,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其《季奕枉诗送行,借审知韵奉别,并呈伯元》抒写对郑公英勇气概的钦敬和深情怀念:“往年敌来如破竹,九州泛若浮海粟。郑公仗节守冯翊,毅然可杀不可辱。飘流南浮适兹里,平生行事耳目熟。几回下马过其坟,溪水洄洄抱山足”,情景交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浑厚的意蕴与顿挫朗练的音律完美融合,可谓“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sup>②</sup>赵蕃描写江南水乡秀丽风光的田园诗,意境优美,笔调圆熟自然,其《漫兴十一首》之一:“桃树深红亦浅红,竹竿个个又丛丛。儿男在田妇行馐,犬卧鸡啼茅舍空”;《三月十七日以檄出行赈贷,旬日而复反。自州门至老竹,自老竹至鹅口,复回老竹,由乾溪上入浦口,泛舟以归,得诗十首》组诗,主要描写湘西农村风情,其四云:“大麦初齐积渐黄,青青小麦更连冈。去冬屡雪有如此,今岁一丰端可望。负笼不须嗟甚苦,腰镰行且看争忙。大仓红腐憎泥土,亦复遥思饼饵香”;其五:“既雨得晴晴亦佳,笋舆终日度咿哑。蒙笼篁竹四三里,仿佛茅茨三五家。邻舍相闻亦鸡犬,田畴随事有桑麻。居夷何陋惭君子,不尔辞官学种畬”,描写了湘西山区农村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风情,蕴含着诗人、农人悠然自得的心境,情韵婉转流畅,笔调清新活泼。

## (二)“悟入”和“自得”:强调自出机杼的独创性

吕本中主张的“活法”理论,并没有否定遵循诗的“法度”,相反,他强调只有通过养气和严格的句法训练,诗歌才能达到“波澜之阔”和“规模令大”,达到“悟入”之后创作的自由境界。他说:“近世欲学诗,则莫若先考江西诸派。”(《童蒙诗训》)陆游和杨万里等大诗人,早期都是通过学习江西诗法,步入诗门,经过了长期的刻苦学习与探索。周必大《次韵杨廷秀侍郎寄题朱氏渔然书院》说:“诚斋万事悟活法”(《文忠集》卷四十一),刘克庄《江西诗派·总序》也称赞杨万里诗歌说:“后来诚斋出,真得所谓活法。所谓流转圆美如弹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见耳。”(《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十五)可见,杨万里

<sup>①</sup>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1页。

<sup>②</sup>[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徐鹏校点:《陈子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页。

的诚斋体对吕本中活法理论的承继和体悟颇深,在当朝即得到了诗坛的肯定。杨万里《诚斋荆溪集序》说:“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学之愈力作之愈寡。……戊戌三朝时节赐告少公事,是日即作诗,忽若有寤,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诚斋集》卷八十)他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忽然有所“悟入”,发现了在诗歌创作中,发扬主体创造精神的关键作用。杨万里《读张文潜诗》说:“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言只听天。”(《诚斋集》卷四十)陆游《颐庵居士集序》说:“文章之妙,在有自得处,而诗其尤者也。舍此一法,虽穷工极思,直可欺不知者,有识者一观,百败并出矣。”(《渭南文集》附录)可见,只有发挥“自作诗中祖”的独创精神,创作中才能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才能真正有所树立而自成一家。

赵蕃与杨万里、陆游、范成大和辛弃疾等人均有交游,关系也比较密切。赵蕃主张通过“饱参”前人作品,获取诗性智慧,并在创作中充分“悟入”并有“自得”,其《观吴兴俞君新之作画于瑞竹,俞君索诗,漫兴四绝句》之三云:“作画与作诗,妙处元同科。苟无自得处,当复奈渠何?”他所谓“自得”,即要求诗人要有自出机杼的独创性。与北宋苏轼、韩驹、惠洪和吴可等人同气相求,赵蕃也曾以禅喻诗,表达了作诗要悟入,反对拘束于句法、字法的雕琢。他曾拟北宋吴可的《学诗诗》三首,阐述自己对“活法”和“悟入”诗学理论的体悟。其一云:“学诗浑似学参禅,识取初年与暮年。巧匠曷能雕朽木,燎原宁复死灰燃。”其二云:“学诗浑似学参禅,要保心传与耳传。秋菊春兰宁易地,清风明月本同天。”其三云:“学诗浑似学参禅,束缚宁论句与联。四海九州何历历,千秋万岁孰传传?”以禅喻诗,源于唐代诗僧皎然,盛行于两宋。赵蕃的三首《学诗诗》,偏重于诗歌创作中的体悟,禅意和诗意含蓄,颇有启发性,为当时诗坛所瞩目。首先,其二中的“心传”,言以心传心。禅宗主张不依经卷、不立文字,而依靠师徒之间心心相印的悟解契合,递相授受。“秋菊春兰宁易地”,谓秋天的菊花、春天的兰花,各有其时节,比喻各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比之诗歌创作,意即诗人要各具面目,不能一味地模拟、因袭。天地之大,历史绵长,大浪淘沙,诗人要想自己的诗作历经千秋万岁,仍能流传后世,就要树立鲜明的个性特点。其次,“束缚宁论句与联”,谓诗歌创作,不能被句法等形式束缚,要达到自然天成的意境。自然,欲达到此种境界,亦非一日之功,而是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修炼。这也是《学诗诗》其中“识取初年与暮年”、“燎原宁复死灰燃”等句的含义:就像死灰可以复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诗人从初年到暮年,孜孜以求,最终成就高妙诗艺和浑成意境。

赵蕃所拟《学诗诗》和吴可原诗相比,内涵异曲同工。吴可《学诗诗》其一云:“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其二云:“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其三云:“学诗浑似学参禅,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sup>①</sup>其中“竹榻蒲团不计年”强调写诗要经过长期的渐修、积累;其二“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反对因袭前人,强调悟入和独创;其三“自古圆成有几联?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标举诗歌创作所达成的透脱圆满的浑成意境。赵蕃《学诗诗》和吴可《学诗诗》的不同之处在于,吴可的《学诗诗》强调作诗要渐修、悟入和意境圆成,寓意明显更直白,且气势纵横,风格劲健豪迈;赵蕃的《学诗诗》,强调“悟入”要体味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特点,注重诗歌意象与生活逻辑的吻合,兴象和情韵更高妙,禅意和诗意完美融合,接近充满机趣、心胸透脱的“妙悟”境界。另外,与吴可和赵蕃《学诗诗》相比,明代都穆所拟三首《学诗诗》,在语言表达上,比吴可和赵蕃诗更通俗易懂。都穆所拟三首《学诗诗》云:“学诗浑似学参禅,不悟真乘枉百年。切末呕心并剔肺,须知妙语出天然”“学诗浑似学参禅,笔下随人世岂传?好句眼前吟不尽,痴人犹自管窥天”“学诗浑

<sup>①</sup>[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1),《吴思道学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3页。

似学参禅,语要惊人不在联。但写真情并实境,任他埋没与流传”(都穆《南濠诗话》)<sup>①</sup>,这三首诗的涵义,与吴可和赵蕃的基本相近,而语意更加直白明晰,可作为吴、赵《学诗诗》的注解。

### (三)“满城风雨近重阳”:因物感兴,抓住灵感妙悟

天才需要灵感,灵感需要长期生活经验的积累。在诗歌创作中,诗人写景状物,以自然天成成为贵:面对自然万物,眼处生心,感发志意而兴会标举。此时,诗人如果善于抓住瞬间即逝的灵感、妙悟,则写景或叙事毫不费力,甚至于自然天成。陆游《九月一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一诗,描写他诗歌创作中“兴”会标举、妙手偶得的成功经验:“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剑南诗稿校注》卷二十五)诗人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终于被眼前打球阅马、华灯纵博、琵琶羯鼓等热闹场景触发,“诗家三昧”等灵感、妙悟涌上心头,作诗时选择素材如同天机编织的云锦一样,自然浑成。正如陆游《文章》一诗中所言:“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剑南诗稿校注》卷八十三)“天成”不是大自然的恩赐,而是技艺高超的诗人偶然得到,更是诗人长期积累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因偶然际遇的触发而灵感乍现。

南宋时期学自江西诗派而自成一体的另一位大诗人杨万里,论诗以自然天机为贵,尤其强调“兴”的重要作用。比如,其《寒食雨中同舍约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云:“城里哦诗枉断髭,山中物物是诗题”(《诚斋集》卷二十),《戏笔》云:“哦诗只道更无题,物物秋来总是诗”(《诚斋集》卷十四),都揭示了诗人因自然万物的触发而兴会标举的创作经验。杨万里在《答建康府大军库监门徐达书》中总结了自己“因物感兴”的写作经验:“大氏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诚斋集》卷六十七)杨万里说自己“初无意于作是诗”,又声称“我何与哉!天也”,可见,他特别看重诗歌创作中“兴”感发志意的作用,尤其强调“兴”是“出乎天”,以自然天机为贵。对此,张毅先生评论说:“与陆游在热闹的社会生活场景中获得‘诗家三昧’不同,杨万里作诗的‘忽若有寤’是在‘少公事’的清闲时刻,他是在清静自然的心理状态下获得创作灵感的。这种方式便于作者捕捉自然界的微妙变化,体察出日常生活里的隽永滋味。故杨万里的创作兴趣集中在天然景物和日常感受方面,有关国计民生和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远不及陆游,也赶不上范成大。但若从艺术创造的角度而言,杨万里这种讲究自然天机的‘兴’,能恢复诗人感官的天真状态,物触感随,如镜照物,毕发皆现,从而获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发现。”<sup>②</sup>此论揭示了杨万里诗歌充满自然灵性和活泼天机的特点和原因。

赵蕃主张诗人要悟入或饱参,主张创作时灵感的呈现,欣赏北宋诗人潘大临“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的浑成意境。据惠洪《冷斋夜话》卷四《满城风雨近重阳》记述说:“黄州潘大临,工诗,多佳句,然甚贫。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有新作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sup>③</sup>潘大临,字君孚,一字邠老,从苏轼、黄庭坚、张耒游,颇受推重。苏东坡贬黄州时,大临与其弟潘大观一起从游于苏轼。赵蕃非常喜欢潘大临及其“满城风雨近重阳”诗句,他的诗集中,有六首诗提及《冷斋夜话》中记述的这个典故,如《催租人至作》《人爱九日,多以

<sup>①</sup>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45-1346页。

<sup>②</sup>张毅:《宋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2页。

<sup>③</sup>[宋]惠洪:《冷斋夜话》(卷4),陈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5页。



靖节之故,仆以邠老七字为可以益其爱者。且连日不雨即风,尤觉此句妙处,赋诗八韵》《连日风雨,有怀沈仲良、欧阳全真》等。其《催租人至作》云:“竹屋煎茶罢,风床散帙余。花残蜂不至,食尽雀来疏。无客对挥麈,有筇扶绕除。兹时潘处士,诗败为催租。”赵蕃对潘处士“诗败为催租”的故事念念不忘,是因为潘大临在重阳节前夕,恰逢秋风秋雨,诗人灵感乍现,迸发出“满城风雨近重阳”这一含蕴深远、意境浑成的佳句。其《连日风雨有怀沈仲良、欧阳全真》亦云:“满城风雨重阳近,此句岂惟时节咏?古今凡历几诗人,独觉柯山有余韵。临川之谢东莱吕,往往怀潘用兹语。我尝评此七字句,政似江边乌臼树。”实际上,赵蕃更早前在辰州(今湖南省沅陵县)为官时写作的《重阳近矣,风雨骤至,诵邠老“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辄为一章,书呈教授、沅陵》,是一篇见解独特、声情并茂的论诗诗,阐述了他对“满城风雨近重阳”意境的体悟,揭示了诗歌创作中因物感兴、抓住灵感妙悟的重要意义:

好诗不在多,自足传不朽。池塘生春草,余句世无取。诗家黄州潘,苏黄逮师友。六义极渊源,一贯相授受。秋风有奇思,簞瓢忘巷陋。奈何催租人,败之不使就。我谓此七字,已敌三千首。政使无败者,意尽终难又。纵令葺成章,未免加钉短。衣锦欲尚綢,何尝炫文绣。一洗凡马空,浪说充天厖。重阳晴则已,雨必风在口。今兹季月来,阴雨变时候。惜惜爵罗门,寂寂鸟噪牖。黄花冷未芳,黄叶扫复有。颇将写吾怀,渠在那出手。并想东篱人,瞻前忽焉后。

首先,从诗中“好诗不在多,自足传不朽”“我谓此七字,已敌三千首”和“秋风有奇思”等句,可以看出赵蕃对潘邠老“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的叹赏与推崇,比之为谢灵运流传久远的“池塘生春草”(《登池上楼》)一句,尤其是“满城风雨近重阳”和“秋风有奇思”等句,表明赵蕃对因物感兴所触发的灵感妙悟的推崇;“秋风有奇思,簞瓢忘巷陋”一联,强调了生活经验和思想积累的重要意义,诗歌是灵感与现实情景融合的结晶,诗歌意象与生活逻辑要吻合。同时,还要及时捕捉住灵感妙悟:灵感一旦涌现,要及时抓住,以免“奈何催租人,败之不使就”的遗憾。其次,好的诗句,应该逼真描绘出生活物象的特征与神韵。“一洗凡马空,浪说充天厖”,语出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斯须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曹将军画的玉花骢形神兼备,足以超越以马为题的画作,究其原因就在于画出了马的神韵。第三,诗要以简练传神的笔墨,刻画出物象的神韵和特征,而不需要夸饰、甚至堆砌辞藻。“纵令葺成章,未免加钉短。衣锦欲尚綢,何尝炫文绣”,认为潘大临彼时只写出了“满城风雨近重阳”一句,虽没有完成全篇,却无遗憾。相反,如果勉强成篇,反而有堆砌杂凑、狗尾续貂之嫌。这与儒家崇尚简约、中庸的审美观一致:“衣锦尚綢”,无需夸饰炫耀。

综上,作为江西诗派在南宋的代表诗人之一,赵蕃的诗学理论,既包括儒家传统的诗学观点,也融入了宋代理学和江西诗派诗论等宋型文化特点;既有对黄庭坚诗歌“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理论和以学问为诗、大量活用典故等传统的传承,更有对吕本中“活法”理论和曾几清新活泼审美特质的体认与发展。从诗歌本体论角度看,赵蕃承继了程朱理学以性理为本体的道德哲学体系,认为气是诗歌的本源,诗歌是儒家理想人格,即儒家的道或程朱理学所谓理或气的外化。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忠实纪传。与上述两个理念密切联系,同时也显示了宋型文化的特点:他认为儒家经典等古代典籍是诗歌的源泉,要广博地研习典籍。另外,正如黄庭坚在《忆邢惇夫》诗中所言:“江山为助笔纵横”(《山谷集》卷九),赵蕃亦提出“作诗政欲江山助”“到处皆诗本”,认为自然山水是诗歌之源。

从诗歌创作论的角度看,赵蕃特别服膺于吕本中的“活法”“悟入”理论,对吕本中“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的内涵心领神会。他强调诗歌创作中“饱览”、“悟入”和“自得”的重要作用,提出诗歌要有自出机杼的独创性,要因物感兴、抓住灵感妙悟,要描绘出生活物象的特征与神韵。

从诗歌创作实践看,赵蕃不但是江西诗派理论的积极倡导者,无疑也是江西诗论的践行者和创新者。他积极实践,创作了大量优秀诗作,风格以洒落自然为主,同时又多姿多彩,部分诗歌达到了

圆融通脱的审美境界。他融合了苏轼的才情与黄庭坚的学识,是一位富有才情的诗人,而不是一味苦吟的诗人。诚如莫砺锋先生所评:赵蕃在两宋诗坛的成就和地位也非常突出,如果说苏轼和黄庭坚是宋代一流大诗人,陆游和杨万里位列其次,那么,赵蕃的诗歌艺术和成就,仅仅稍逊于陆、杨而已。

(责任编辑:张 升)

## On the Poetic Theory of Zhao Fan: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Jiangxi Poetry School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I Changzhou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poets of Jiangxi Poetry School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o Fan created a large number of high-quality poems, and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poetry circl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is poetic theory includes not only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poetics, but also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ng Dynasty, such as neo-Confucianism and the theory of Jiangxi Poetry School. Ontologically, he held that *qi* 气 (literally gas) is the noumenon of poetry, and poetry is the externalization of the Confucian *tao* 道 (way) or the Neo-Confucian *li* 理 (principle) or *qi* advocated by Cheng Yi, Cheng Hao and Zhu Xi in the Song Dynasty, as well as the expression of the poet's true temperament and the reflection of real life. In addition,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wo concepts mentioned above, his other two important views were that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other ancient books were the source of poetry, and the natural landscape was also the source of poetry, which clearly show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ng Dynasty. In terms of creation, Zhao Fan especially accepted Lü Benzhong's theory of "living method" and believed that the poetry should be valued by its naturalness, so he fully appreciated Xie Tiao's view that a poem should be "as sleek, round and beautiful as a cannon ball".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theory of "living method", Zhao Fan emphasized the important role of "getting into" and "self-sufficiency" in poetic creation: namely, poems should be creatively popped up in the poet's mind, be inspired by the objects in the world, be good at grasping the inspiration, and depi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harm of life objects.

**Keywords:** Jiangxi School of Poetry; Southern Song Dynasty; Zhao Fan; poetic theory

**About the author:** SHI Changzhou, PhD in Literature,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Art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